

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



少年

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

少年

文 颖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ПОДРОСТОК

据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8,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
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7) 译出。

少 年
SHAONIAN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501,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2\frac{5}{8}$ 插页 3

198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8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21,500

书号 10019·3850

定价 4.30 元

出版说明

《少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群魔》之后完成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发表于一八七五年。

一八七一年发表的《群魔》，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革命民主主义阵营疏远了。一八七四年，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过密切交往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建议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新作《少年》送给当时最进步的刊物《祖国纪事》发表，后者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能够恢复与涅克拉索夫的关系，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由衷的高兴。对于作家后期的创作来说，这是一桩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在《少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当时的俄国社会描绘了一幅广阔的图画。随着古老的封建宗法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崩溃，早先的道德基础也开始迅速瓦解。分崩离析，精神空虚，道德沦丧，贪得无厌，压倒一切的敛财欲——这就是当时俄国社会的特点，结果是“自杀流行病”开始在全国蔓延，贵族、知识分子、商人、农民和工人，都以令人不可思议的轻率态度或是开枪自杀，或是割断咽喉，或是投水自溺，或是悬梁自尽。在《少年》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四起自杀事件：多尔古申分子克拉夫特，一个在报上登了一则求职广告的女教师，一个被商人冷酷的“爱抚”吓坏了的七岁小男孩，以及身强力壮的安德烈耶夫。在小说的末尾，韦尔西洛夫也想开枪打死阿赫马科娃，然后开枪自杀。

小说的主人公阿尔卡季·多尔戈鲁基，也掉进了这个人人贪得无厌、渴望发财致富和精神土崩瓦解的漩涡。他是贵族韦尔西洛夫和一个农妇的私生子，受尽了人们的欺凌和侮辱。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他满脑子都是发财致富和当百万富翁的思想。这个少年深信，金钱可以使人自由自在、为所欲为，金钱是“唯一能够使一个哪怕微不足道的人出人头地的手段”，他曾这样形容金钱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无边法力和广大神通：“我也许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可是我，比方说吧，从镜子里知道，我的外貌害了我，因为我的脸长得很平常。可是，假如我象罗特希尔德那么富有，那么谁又会过问我的脸长得如何，只要我吹一声口哨，岂不就会有成千上万的美女朝我飞来？我甚至深信，到了最后，她们自己也会十分真诚地认为我是个美男子。我也许很聪明。可是不管我有多么聪明，社会上也定会找到比我更聪明的人，于是我就完蛋了。然而，假如我是罗特希尔德，那么这位比我还聪明的人在我身边还有什么意义呢？假如他站在我身边，甚至都不会让他开口的！……金钱当然是一种专横的势力，然而也是最高的平等，它的全部主要力量就在于此。”

但是，同生活发生的冲突，同各种不同人物的交往给少年留下的种种印象，使他逐渐摆脱了这种利己主义的思想，开始了新的生活。在探索人生的真谛时，阿尔卡季竭力同包括革命者在内的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物接触。小说描写了少年同杰尔加乔夫小组成员的会见。在杰尔加乔夫身上，反映了当时俄国的一个革命组织——多尔古申小组的许多观点。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少年》中对革命者的描写，却与他在《群魔》中对涅恰耶夫分子的描写有所不同。尽管作家依旧对革命思想持否定态度，但他在《少年》中议论那些想从生活的种种矛盾当中找到一

条出路的年轻人时，采取的却是谅解和同情的口吻。

韦尔西洛夫是《少年》中最复杂的形象之一，就象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其他许多主人公那样，是一种特定思想的体现者。如果说，作家企图通过阿尔卡季表现年轻一代，即儿辈的探索和精神生活的话，那么韦尔西洛夫则是父辈的代表。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了韦尔西洛夫内心的矛盾、他的各种观点的模糊不清和变化无常。他被作家想象为高级知识分子，一个虽然脱离人民却又向往人民的贵族，同贵族阶级的一切优秀分子一样。韦尔西洛夫认为，要理解生活的意义，只有以受苦为代价，所以他渴望受苦，但是又得不到受苦的机会。他幻想着人类的“黄金时代”，幻想着一切人的和睦与幸福，同时对于用革命手段改变世界的可能性又深表怀疑。他认为，革命会摧毁人类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总之，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韦尔西洛夫纯系欧洲文明的产物。在《少年》的结尾，作者通过尼古拉·谢苗诺维奇之口对韦尔西洛夫作了这样一个评价：“他是一支最古老的贵族的后裔，同时又是巴黎公社社员。他是真正的诗人，他爱俄国，然而又完全否定它。他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可是几乎愿为一种模糊不清的东西去死，这种东西他都叫不出名字来，可是他却热烈地信仰它，就象俄国历史上彼得堡时期许多传播欧洲文化的俄国人那样。”

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构思，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应该是《少年》的中心人物，就象《战争与和平》中的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一样，是一个思想上的顶峰。马卡尔是小说中作为正面人物出现的一个来自民间的普通人，过去是韦尔西洛夫的农奴，曾深受老爷的欺侮。正如在写作《白痴》时塑造梅什金公爵的形象那样，作者在写作《少年》时，企图通过马卡尔这个形象再次体现他

对理想的人的看法，这种理想的人热爱生活，热爱人们，幻想着未来的幸福社会，具有极为纯洁的心灵而无丝毫的自尊心。同梅什金公爵一样，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在小说中扮演的，也是基督教的温顺、仁爱和悲天悯人思想鼓吹者的角色，他的使命，仍是把读者引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动观点：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面貌的不是社会斗争，不是革命，而是“人的内心自由”，是基督教的教义。

尽管《少年》中仍有上述反动的说教，但是，由于作者在这部作品中极为严峻而真实地表现了“这个世界的面貌”，因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二个时期的一系列长篇小说中，《少年》无疑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我们从当时俄国批评界对《少年》的评价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反动批评家阿夫谢延科指责《少年》是一部“极端自然主义”的作品，说它描绘了“在地下室聚集起来的全部垃圾”。他还责备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了解具体的现实，而是用对“地下室”的精神病人那种荒诞的描写来代替现实。但是，进步的批评界对小说则一致给以好评。涅克拉索夫和谢德林对《少年》都“极为满意”、“赞不绝口”，甚至“感到狂喜”（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民粹派评论家特卡乔夫在《群魔》发表时曾写过两篇长文，对这部小说的反动思想感到愤怒，但在《少年》发表以后，他却称赞作者“无疑是个大天才”，“在当代的艺术家（而且不仅是俄国艺术家）中，只有很少的几个能如此深刻地窥见人的心灵”。特卡乔夫认为，少年是个活生生的具体形象，他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通常从中挑选自己主人公的那个社会集团，是杜勃罗留波夫所说的那一类“逆来顺受的人”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最新变种。特卡乔夫觉得，《少年》比《罪与罚》写得好，尽管《罪与罚》的主人公也

是一个“有思想的”逆来顺受者，但是在《罪与罚》里，对主人公的心灵作的分析是“极为片面也不充分的”，但在《少年》中，“这种分析是那样深刻、那样细腻而又比较客观”，因此，进步的批评界“应该特别注意这部长篇小说”。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中提到《少年》时也曾指出：就对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惨无人道提出抗议的力量和激情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少年》中的一些地方实际上已达到了谢德林在《时代特征》中所达到的高度。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目 次

第一部	1
第二部	249
第三部	437

第一部

第一卷

第一章

1

我忍不住要坐下把我踏上生活舞台的最初经历写出来，其实不写也没什么。有一点我敢肯定：即使我活到一百岁，我也永远不会再坐下来写我的自传。只有过分卑鄙地爱自己的人，才会不知羞耻地写他自己。我只能用下面的理由原谅自己：我写作的目的跟别人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不是为了博得读者的赞扬。假如说我忽然想把从去年起所遭遇的一切一字不差地写下来，那只是出于内心的要求，因为发生过的那些事使我非常震惊。我只想记下那些事情，尽量避免不相干的描写，主要的是，尽量避免文学上的浮华。有的文学家写了三十年，到头来却完全不知道这么多年来他写作是为了什么。我不是文学家，也不想作文学家，我认为要把我的内心世界和种种感情的优美描写硬送到他们的文学市场上去，是不体面的、卑鄙的。然而，我又苦恼地预感到，完全不描写感情，也不表示任何见解（也许，甚至是庸俗的见解），似乎也不可能，可见任何文学创作，即使只是为自己而写，也会对人有着极坏的影响。有些见解甚至可能很庸俗，因为你自己重视的东西，很可能在别人眼里却没有任何价值。不过这都是题外话，然而也可以算作一篇前言。以后这一类的话再也不会有了。现在言归正传，虽然再没有比着手做一件事

更难的了，也许，万事都是开头难。

2

我要开始写了，也就是说，我要从去年九月十九日起写我的札记，也就是恰好在那一天我第一次碰见……

可是假如读者什么都不知道呢，我就先来说明我碰见了谁，那未免庸俗，我甚至认为这种格调也是庸俗的。我答应过要避免文学上的浮华，可是我从头一行起就落到这种浮华里去。此外，要写得有条理，看来光凭愿望是不够的。我还要指出，用任何一种欧洲语言写作似乎都不如用俄语写作那么难。现在我重读了一遍刚刚写下的那些行，我觉得，我比我写出来的东西要聪明得多。一个聪明人说出来的话要比留在他心里的想法愚蠢得多，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最近这倒霉的整整一年中，我跟人们交谈的时候，不止一次地注意到自己的这种情况，为此我很苦恼。

虽说我要从九月十九日写起，但还是要插上两句话，先讲一讲我是谁，在那天以前我待在什么地方，因而在九月十九日那天早上我头脑中可能有些什么想法，这样写可以使读者明白些，或许我自己也会觉得清楚些。

3

我是中学毕业生，现在已经二十一岁。我姓多尔戈鲁基，按法律来说我的父亲是马卡尔·伊万诺夫·多尔戈鲁基，他以前是韦尔西洛夫老爷的家仆。从表面上看来，我是合法婚姻所生，

其实我是非常不合法的私生子，我的出身丝毫不容怀疑。事情是这样的：二十二年前，地主韦尔西洛夫（他就是我的生父），当时二十五岁，到他在图拉省的庄园去。据我现在推测，那时候他的性格还完全没有成熟。奇怪的是，尽管这个人从我的童年起就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对我整个心灵的气质有过那么大的影响，甚至还可能长久地影响我的整个未来，可是这个人直到目前为止在很多很多方面对我说来还完全是一个谜。不过，说实在的，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说。对这事不能这样随便地叙述。即使不这样，我的整个札记也会处处提到这个人的。

那时候他正好鳏居，也就是在他快满二十五岁的时候。他本来娶了一个姓法纳廖托娃的上流社会的姑娘，可是那姑娘不很富裕。她给他生下一儿一女。有关这位过早离开他的夫人的情况，我了解得不多，仅有的一点材料也丢失了。而且韦尔西洛夫私生活的很多情况都瞒着我，因为他对我总是那么骄傲自大，沉默寡言，漫不经心，尽管有时对我又仿佛温和得出奇。然而，为了使事情清楚起见，我要预先提到，他一生中已经花掉三份产业，而且是非常大的产业，总共有一千四百多个农奴，也许还要多些。当然，现在他一文钱也没有了……

他那时候到乡下来，“上帝才知道是为了什么”，至少后来他自己就是这样对我说的。他那两个幼小的孩子照例不在他的身边，而在亲戚家。他一辈子就是这样对待他的子女，不论是婚生的还是私生的都一样。在这个庄园里，家仆是相当多的，其中有一个园丁名叫马卡尔·伊万诺夫·多尔戈鲁基。为了以后再也不提这件事，我要在这儿插几句话：很少有人会象我这样，一辈子都那么恨我的姓。当然，这是愚蠢的，可是事实正是这样。每一次，不论我进哪个学校，或者碰见我应该向他说明情况的长

辈，总之，每一个不足道的老师、家庭教师、学监、教士，不管是什么人，问到我的姓，听见我姓多尔戈鲁基，不知为什么一定认为必须再问一句：

“是多尔戈鲁基公爵^①吗？”

每一回我都得对这些无聊的人解释道：

“不，是平民多尔戈鲁基。”

这个平民最后弄得我快发疯了。在这儿我要把它当作怪现象指出来，因为我记得没有一个例外：人人都这样问。显然，有些人完全没有必要问，我真不知道，见了什么鬼，怎么可能不管是谁都要问呢？可是人人都问了，没有一个不问的。听说我是平民多尔戈鲁基，问的人通常总是用呆板、迟钝、漠不关心的眼光打量我，这证明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问，问完，他就走开了。同学们问起来最使人难堪了。那些学生怎样盘问一个新生呢？一个孤单的、害羞的新生第一天进学校（不管进什么样的学校）总是成为受气包：大家命令他，逗他，对待他就跟对待仆人一样。一个健壮的、胖乎乎的顽皮男孩忽然直直地站在这个受气包面前，用严厉而傲慢的眼光观察他几秒钟。新生默默地站在他面前，斜着眼睛瞧他，假如新生不是胆小鬼，就等待着，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姓什么？”

“多尔戈鲁基。”

“是多尔戈鲁基公爵吗？”

“不，是平民多尔戈鲁基。”

“啊，是平民多尔戈鲁基！真是傻瓜。”

① 十八世纪时有许多姓多尔戈鲁基的公爵在沙皇政府担任要职。

他说得对：姓多尔戈鲁基，又不是公爵，再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了。虽然我自己没错，却不得不背着这种愚蠢的包袱。后来我很生气，一听到有人问：

“你是公爵吗？”

我总是回答说：

“不，我是家仆的儿子，我父亲原先是农奴。”

再后来，我气极了。有一次听到别人问：您是公爵吗？我坚决地回答说：

“不，我是平民多尔戈鲁基，是我以前的主人韦尔西洛夫先生的私生子。”

我想出这样的回答已经是在中学六年级了。虽然不久我就深信不疑，这是愚蠢的，可是我仍旧没有马上停止说这种蠢话。我记得有一位教师（不过，只有他一个人有这样的看法）认为我“充满爱报复的公民思想”。一般说来，大家听见我这种狂妄的回答都沉思起来，这使我感到难堪。最后，有一个同学，一个爱挖苦人的男孩，我跟他一年中总共只说过一次话，他带着严肃的神情，可是眼睛略微瞧着一边，对我说：

“当然，这样的感情为您增光，而且毫无疑问，您有可以夸耀的东西。不过我要是处在您的地位，还是不会因为自己是私生子而兴高采烈……您却好象在过命名日似的！”

从那时候起，我就不再夸耀我是私生子了。

我要再说一遍，用俄文写作很困难：我在这儿写满整整三页，描写我一生中怎样为我的姓氏大生其气，然而读者一定会认为，我生气正因为我不是公爵，而是平民多尔戈鲁基的缘故。假如我再解释一遍，为我自己辩护，那就有损我的尊严了。

总之，在庄园里家仆是很多的，除了马卡尔·伊万诺夫之外，家仆中有一个姑娘，已经十八岁，这时五十岁的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忽然露出要娶她的意思。大家都知道，农奴制时代家仆们的婚姻，要经主人许可才能成立，有时候简直就是由他们包办的。当时在庄园附近住着一位姑姑，其实她并不是我的姑姑，她本人是个女地主。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她一辈子当中人人都称她为姑姑，不仅我叫她姑姑，而且一般地说，谁都叫她姑姑，就连在韦尔西洛夫家里也一样，实际上她跟韦尔西洛夫几乎没有什么亲戚关系。她就是塔季扬娜·帕夫洛夫娜·普鲁特科娃。那时候她在本省本县还有三十五个农奴。她并不是管理韦尔西洛夫的庄园（有五百农奴），而是就近监督，我听说，这种监督抵得上任何一个有才干的管家。不过，她的能力完全与我无关。我不想奉承和恭维她，只想补充说：这位塔季扬娜·帕夫洛夫娜不仅是个高尚的人，而且简直是个奇特的人。

喏，就是她，不仅不劝阻忧郁的马卡尔·多尔戈鲁基要结婚的打算（据说当时他很忧郁），而且正好相反，不知为什么还极力鼓励他们。索菲娅·安德烈耶娃（即十八岁的女仆，也就是我的母亲）是个孤女，父母已经去世好几年了。她那死去的父亲，生前也是个家仆，他非常尊敬马卡尔·多尔戈鲁基，还受过他一些恩惠。六年前他临终时把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叫来，当着所有农奴的面，还有教士在场，指着女儿，坚定地大声对他留下遗言：“等她长大，就娶她为妻吧。”据说，这是他断气前一刻钟说的，因此，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认为这是说胡话，此外，作为一个农